

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郑新立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过去40余年来，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历史的发展成就。新时代，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我们面临着新挑战、新机遇，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解决需求收缩突出问题亟待通过改革释放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经过努力，需求收缩的态势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扭转。直到今年一季度，衡量总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仍然为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仍为-2.7%。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仅为0.5%。应当看到，需求收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之功。三年新冠疫情是导致需求收缩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过高的投资率和明显偏低的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至2020年的40年间，前20年即1981—2000年的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年均均为62.7%，投资率年均均为36.4%，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大体合理。这主要是吸取了过去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的教训，适度降低了投资率、提高了最终消费率的结果。从2000年至2020年的后20年，客观上由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处于投资高峰期，投资率不断攀升，年均高达42.3%，比前20年高5.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0%，比前20年低8.7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47.0%的历史峰值。从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总体上看，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从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导致总供求失衡，消费不足。因此，解

决当前存在的需求不足问题，应当从改革入手，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上，要建立规划、财税、货币相互协调的机制，通过综合施策，努力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既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又防止出现通货紧缩，使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态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所占比重，使广大居民手中有钱能消费。同时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无后顾之忧敢消费。还要增加适销对路商品和服务，优化消费环境，使人民愿消费。对于像住房、汽车等消费品，其市场行情对经济稳定影响较大，要改进产销管理制度，不能轻易出台行政限购规定，从而为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要深化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激发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使教育、医疗、养老、数字、旅游、文化、体育、咨询、法律等服务消费成为新增长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巨大的需求潜力有待通过改革加以释放，从而激发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投资能力。截至今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超过300万亿元。如何把社会资本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产业和区域上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必须按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要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城乡融合的要素市场，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城乡市场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城市，支持了城市繁荣，但城市的要素向农村流动存在着多种政策壁垒，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差距本质上也是城乡差距的反映。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吸引生产要素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由于后者与前者相比，不可能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发展问题，公益性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值实现困难，导致要素投入不足，以致成为发展的短板。所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既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导向、财政支持等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新型举国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重点，应当放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继续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方面。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为此，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针对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从我国当前教育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应按照“加强两头、巩固中间”的要求，大力提升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持续巩固基础教育质量。学前教育应以有益于智力发展的技能教育为主。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随年龄增长呈递减趋势，年龄越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应加快通过“学前教育法”，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公平发展。围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持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鼓励各类大学在教育科研上求新求变，办出特色。促进产教、科教融合，选拔优秀人才进入高校教师队伍。改进教育评价机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针对当前技能型人才短缺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增加技能型人才

成长通道，鼓励职业院校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建立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的“立交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基础教育要着力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教育支出的均等化。教育资源配置要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随父母常住地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科技强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企业、科研机构 and 大学的创新能力，调动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一是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围绕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统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的资源，强化协同创新，构建高效、竞争、有序的国家创新体系。二是优化科技创新主攻目标和创新格局。针对“卡脖子”技术和前沿科技难题，分别组建强大科研团队，制定攻关计划，明确目标要求和责任制，力求尽快突破。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抓紧培育一批具有超强创新能力的企业，通过财税金融政策以及政府订单等措施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培育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骨干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企业创新生态。推广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提高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四是坚持开放式创新。吸引国际科技人才来华工作，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谨防美西方“脱钩断链”，使我国科技创新陷入被动封闭状态。五是大力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原创和科学探索精神，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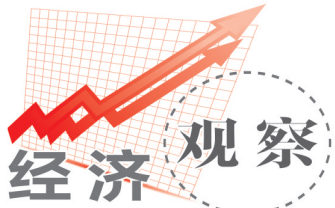
人才强国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建设人才强国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从政治和战略高度强化人才意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升创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完善国家战略人才体系，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学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形成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破除在人才评价、考核、引进、使用、管理、流动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障碍。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

制度型开放就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主的开放，与过去以商品和要素为主的流动型开放相比，对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推动国内多领域深层次改革，增强开放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实施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按照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要求，主动对接、调整。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主要成员之一，我国全面履行了承诺和义务，零关税比例已超过65%，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准等方面也将实现统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具有开放标准高、覆盖范围广、边境后议题多等特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采购、补贴、劳工标准、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反腐败等多个领域。我国已正式申请加入，需相应推进国内各领域改革。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正按照CPTPP规则要求，制定“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配套条例。我国还启动了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进程，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对接，建立数字贸易市场。我国6G技术专利申请量居全球首位。加入CPTPP、DEPA，可助推我国技术标准专利成为国际标准。我国服务贸易存在大量逆差，实行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扩大我国服务出口。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服务需求。通过对接国际贸易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教育、医疗服务、增值电信、文化、研发设计等市场准入，对于促进国内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我国服务业全球竞争力，进而带动高质量发展，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上接1版）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科学把握守正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

守正，就是要坚守初心、回归本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必须发挥好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也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契机。要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好全球化独特优势和综合化经营特色，主动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构建协同顺畅、高效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全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回答好服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道“必答题”，通过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不断为经营主体提供多层次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强化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金融动能。

创新，就是要识变应变、主动求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一方面，对标市场，提升竞争能力。突出市场导向，在优化结构上精耕细作、持续发力，打造“痛点切入+全方位业务跟进”的一揽子服务方案，为市场提供全周期、全链条、全覆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化在支持精准营销、管理决策、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乘数效应，筑牢数字化转型基石。另一方面，深度挖潜，提升治理效能。进一步厘清党委和“三会一层”职责边界，强化党委前置把关作用，切实将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司治理效能。顺应新形势新任务，稳妥提升组织架构适配性，优化考核指标体系，强化竞争力提升和长周期考核，引导全行既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既算短期账，又算长期账。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境内和境外有效联动的系统观念

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对强国建设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谨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必须紧跟国家外事外交、经贸战略部署，强化境内和境外机构有效协同，提高全球布局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更好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坚持把支持设施“硬联通”和金融“软联通”结合起来。全力落实高访签证项目成果和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积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助力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区域合作，做优熊猫债、中资离岸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间参行等重点业务，参与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促进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循环。

坚持把推动“走出去”和服务“引进来”结合起来。加大“稳外贸”金融支持力度，发挥国际贸易结算、跨境电商结算和外币业务领先优势，强化“新三样”出口服务，助力国内企业更好融入全球资金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积极服务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等国家级重大展会，举办全球撮合对接活动，助力地方政府跨境招商引资。积极服务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助力提升投资中国金融市场的便利度。

坚持把提升服务能力和建强人才队伍结合起来。进一步推动落地境内外协同机制、以客户为中心的全球一体化综合服务模式，强化差异化定策，健全“一点接入、全球响应”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全球化综合化服务的整体合力。加大全球化金融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做好境内外人才交流，完善外派人员选派流程，因地制宜做

好境外本土员工的管理和使用，培育和储备一批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既熟悉商业银行又了解综合经营业务，既熟悉国内情况又经过海外摔打锤炼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处于风险易高发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统筹防范境内外、表内外、传统和非传统风险，自觉当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更要保证高质量安全。必须清醒认识到，错失发展机遇就是风险，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要牢牢推动高质量发展，破解前进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正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压紧压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政治责任，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防和灭的关系，提高风险预见能力、应对能力和处置能力，确保既有防风险的先手棋，也有应对和化解的关键招，切实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和蝴蝶效应。

既要做到全面无死角，也要避免简单一刀切。一方面，全面掌握各地区、各条线、各领域的风险底数，提升风控智能化水平，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拉紧责任链条，完善产品管理制度和流程，强化内控案防工

作，实现全覆盖、穿透式管理。另一方面，坚持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根据不同机构的外部环境、客户基础、管控能力，实施精细化管理和差异化定策，针对境外机构特殊环境，“一行一策”制定境外风险策略，有效管控制裁合规风险，增强风险管理精准性，真正做到既把风险管住，也避免把业务管死。

既要防控传统风险，也要关注非传统风险。一方面，加大重点领域风险处置力度。按照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要求，深挖大额不良问题根源，定期开展风险全面和专项排查和分析研判，制定有效可行的应急预案，积极稳妥推进存量风险“出清”，严控增量风险。另一方面，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风险防范。将非传统安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加快推进核心银行业务系统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消费者保护、舆情、信访、安全生产等领域问题隐患排查和整治，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避免风险关联传染、叠加共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有效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相互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和最新要求，为金融业注入了赓续传统、积极向上的基因。

坚持学习研究与深化实践一体推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加强专业性、系统性、持续性研究，系统谋划文化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入脑入心的文化活动，让千部员工记得住红色荣光、看得见红色印迹、守得住红色根脉。

坚持强化观念与规范行为一体推进。一方面，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做好正面宣传引导。另一方面，推动“五要五不”理念贯穿融入经营管理各方面，明确价值导向，强化激励约束，促进文化柔性和制度刚性相互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

坚持对内培育与对外传播一体推进。统筹运用多种媒体资源，加强与国家级核心文化平台和载体深度合作，推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当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金融使者，为讲好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银行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助力金融强国建设。